

现代与传统的碰撞

——论师承关系对“五四文学”的参与

高晓瑞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五四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被各种主义或思潮所定义。现试图以师承关系作为切入点,重新阐释“五四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师承关系发展到“五四”时期,在师父身份、伦理情感、传承功用、师父学术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层面上已然与传统师承关系有了较大改变。从师承关系出发重看“五四文学”,不仅能发现师承关系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着“五四”文人观念的表达和立场的选择,还能以之作为重新审视“五四”现代性评价标准的视角。从文学活动的角度看,文学社团、文学刊物、文学论争、文学创作等“五四文学”的各方面,都与师承关系有着关联。

关键词:师承关系;现代性标准;文学活动“五四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9)04-0045-09

DOI:10.16061/j.cnki.cn46-1076/c.2019.04.006

“五四文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狭义上讲,它可理解为1917—1919年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五四文学”革命。但从广义上讲,“五四文学”又可指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在1917—1927年间应运而生的包含各种社团流派、创作体裁的文学,即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但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五四文学”,一直以来都被启蒙和救亡等概念定义,这些概念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文学”的主潮,却不能完全解释“五四”文坛发生的种种差异和论争,也不能解释传统文化发展到“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就在批判之下偃旗息鼓。选择师承关系作为切入点,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文人的交往与观念传承,即试图为“五四文学”的发展给出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因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师承关系发展到“五四”时期,本身具备了怎样的新变。其次则是明确现代师承关系与文人立场的关系,以及采取师承关系这一角度对现有文学史的叙述有何意义。最后则是具体考察师承关系对“五四文学”活动各方面的参与。

一、现代师承关系的“守”与“变”

之所以把聚焦点投向师承关系,首先是“五四”时期对于“师”的呼唤。“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传统伦理道德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走向没落,而新的思想尚在探索和孕育当中,青年们人人都可以振臂一呼,追求着自由的风气。但狂热的情绪使人无法进行冷静的思考,正如大肆批判传统后势必会导致精神信仰的缺失,在青年们惶惶之时,他们迫切希望大师的出现,以填补这一空白。同样,在新文学方兴未艾之时,文化精英们要想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拥有足以形成派系的追随者。因此,大师弥补了青年人因信仰缺失导致的精神危机,而弟子们的追随则使得话语权“群体生产”的“五四”时代有了文人群体的产生。

这些现代文坛的师父们类似于精神的指引者,正如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出现过三种权力

收稿日期:2019-04-30

作者简介:高晓瑞(1990—),女,四川自贡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

类型^①分别为传统的权威、“查里斯玛”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查里斯玛”的权威是传统权威与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现象，被其视为“领袖的超人魅力”^②，它显示着人与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类似于一种时代英雄。在马克斯·韦伯眼中，“‘文化士人’是中国的实际领导阶层……文化士人作为一个群体，认为他们自己是集专业荣誉和中国文化的惟一承载者两者于一身的一个合体。”^③在“五四”这个新旧更替的时代，文化精英们以天下为己任，率先垂范，引领时代风气，自觉充当青年的引路人和精神导师，并吸引青年围绕在其身旁、自愿继承其思想主张，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师为中心、弟子云集的文人圈子或社团流派。朱寿桐曾指出，现代文人社团区别于古代文人结社的关键就在于，现代社团主要是依靠“知识权威”为聚合的精神支撑，而古代则需要“闲、钱、权、资质”。^④“知识权威”即为社团的精神领袖，起着指引和聚拢成员的作用。而这些精神领袖如何成为青年人的“师父”，现代师承关系与传承师承关系有何不同，这是需要考察的。

从“五四”师承所具备的内涵来看，有类似却不完全同于传统师承的一面。师承关系作为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的一种，体现着师徒间文化的传承，一脉而下的师父弟子之间往往有超越血缘的亲密与信任。“五四”时期虽提倡反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的束缚，但归根究底，也并未对人伦中应负的责任和礼仪全然抛弃，尤其是面对有知识传授之恩的师父。所以从伦理情感上讲，“五四”师承既有传统的同门情谊下弟子对师父的孺慕，又有师父对弟子的爱护。但由于“五四”处于破旧立新的大变革时期，师承关系却又属传统人际关系之一种，所以“五四”师承必定在中西文化的双重洗礼下有新的特点。弟子们的“转益多师”和“破门而出”就是现代师承的特有表现。可不论弟子的锐意创新有多违背师说，现代师承还是依然保有与传统师承相似的伦理情感特征。

从师承的功用看，现代师承也和传统师承一样，具备传承学术的作用，显示着知识分子之间知识观念的传递与发展。但现代师承却因留学风潮

的兴起以及教育制度的革新，在师徒关系的形成上，与书院式教育下产生的传统师承产生了不同。譬如“五四”时期就读于各高校的学生，可能会有很多授课老师；而老师因在不同的地方讲学，由于课程内容的不同亦会拥有承袭其不同学识的学生。所以对于“五四”时期的“师”，区别于传统师父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既是及门弟子的师父，又是现代院校里众多青年学子心目中的文坛大师。但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师承关系最重要的一点都在于学术传承，即师父需要弟子继承自己的思想，弟子也需要把师父的主张加以发扬光大。所以对于现代师承关系中的师父而言，惟有真正与之思想契合并在之后予以实践的学生才能被算作弟子，师徒关系与师生关系之间虽有交叉却不完全等同。有时候一些没有听过大师课，却能通过报刊等形式吸纳其思想，并在个人的文学创作中加以追随的也可算成另一层面的弟子。

现代师承关系与传统师承关系的区别则体现在大师们的学术背景上。王富仁曾称20世纪的文化是“留学生文化”^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革新都离不开留学生的建设。清末以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西方各国的坚船利炮使得有志青年惟有通过留学才能获得立身的资本。留学西方除了获取大量新知识以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多了很多的洋师，如杜威之于胡适，白璧德之于“学衡”诸人，罗曼·罗兰、瓦雷里之于傅雷和梁宗岱，泰戈尔、罗素等之于徐志摩，“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⑥基本都在“五四”文坛一一呈现。他们在回国后的学术走向和观念生成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学术背景有关，因为不同的师承产生了不同学术路子，从而导致各个门派的对立。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造成“五四”时期某些论争的深层原因。

现代师承与传统师承的区别还在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传统文人拜师与尊师主要还是为了学术追求，因科举考试结成的座主门生关系以及同年关系，也可看成是文人实现个人抱负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更不论传统文人的聚合，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享受诗酒山水，“以吟风弄月、崇尚风雅为表现形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1页。

② [德] 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③ [德] 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第122页。

④ 朱寿桐《现代文学社团与传统文人会比较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⑤ 王富仁《王富仁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⑥ 沈雁冰《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雁冰答周赞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10日。

式,同时亦有把酒弄盏的生活场景,以及团体成员的志趣合一。在朝官员在政务之余,为打发闲暇,消除寂寞,可以结成诗社;士人为切磋诗艺,亦可以结成诗社;还有官员致仕以后,在乡无聊,纠合同道,同样可以结成诗社。”^①即使有为应付科举考试而结成的文会、文社,也同样存在诗酒聚会的场面,每个人参与诗社或文社都为了丰富日常生活,显示着风流消闲的一面。所以可以认为传统师承下形成的文人集合,其目的更多是偏向个人的发展或成才的,师父对弟子有授予知识之恩,在伦理情感上对弟子则有父亲般的恩义。

而现代师承关系的形成则有所不同,它与社会关联性更大。不论是师父或是弟子,在结成师徒关系的时候,都有自主目的或是被动选择的因素在里面。就拿“五四”时期在文坛上掀起风浪的文人群体来说,一些文化大师就有意造成声势,形成自己的追随者群体,如胡适就好作“青年导师”,曾在日记中自剖心意“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②此时胡适尚且还在留学,就准备着回国之后要作导师了,简直是好为人师!但揣度其本意,亦是志在匡扶青年也。至于途径,他则主要是通过办刊物、利用大学教授身份进行讲座、设私人文化沙龙等方式来聚集青年。可另一些大师如鲁迅则公开表示厌恶所谓的“文化权威”一名,鲁迅曾发文暗讽胡适,称“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③但实际上鲁迅也通过培植社团、创办刊物等形式聚拢了大批青年。

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所熟知的文坛大师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声名远扬、影响之广,到底是因为其本身的思想观念使青年折服,还是他们有意地运用一些手段来造成门派、形成声势?为什么“五四”时期很多文化名人同为大学教授,却依旧未能达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高度,这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这些大师有意培养承袭自己学说的弟子,试图聚拢青年并形成文学社团,不仅有把学说传承下去的目的,更是为了在文坛扩大影响。因为“五四”时期的时代因素所限制,一种新文学思想要形成声

势必需要靠群体作战。而对于弟子来说,他们得益于现代大学教育的兴起,使得自己与文坛大师之间的沟通更为便利,在博采众长之外更能选择真正愿意跟随之人。更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期的“弟子”,他们拜师还有一重目的,就是能在师父庇佑下更容易进入新文学界,拥有更多的发表文章的刊物来源,观点的提出也能在师父主张之下得到同行的认可,从而逐渐在文坛立足。因此从师父扶植弟子与弟子自愿亲近师父来看,“五四”时期的师承关系在形成上有了一定的功利目的和利益关系,即师徒双方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力量在文坛上能有一番作为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使得现代师承关系与社会产生了更多的联系。除此之外,现代教育制度下授课老师的分配,使得师徒的相遇有了很大的随机性,都显示着社会安排对师承关系形成的影响。

所以传统师承关系更多是关乎个人的,而现代的师承关系与社会关联性更大。随着社会资源甚至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师承关系的发生、结成形式乃至目的都会随之发生变动。与此同时,现代师徒关系会相对松散,师父对弟子产生的伦理和知识传承上的作用也就相对减小了。但反过来,社会形态及生活内容参与进现代师承关系的发生过程中,亦带给文人体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师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还包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纠缠在一起,使得参与“五四文学”的主体在参与现代文学进程时,有了超越传统人伦情感和人际交往的选择。所以这种丰富的、复杂的、涉及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利益的现代师承关系,将如何影响“五四”文人的选择,又将从哪些方面参与进“五四文学”,这是将要考察的。

二、师承关系与“五四文学”“再叙述”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对“五四”文人群体的书写都是与社团流派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方式虽然能看出个体的差异,但在面临一些具体的现象时,却无法完全用流派不同一概而论。掩盖在文学史叙述话语下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师徒关系与同门关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同门关系对文人

^①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8页。

^②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 1915—1917》,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③鲁迅《导师》,《莽原》第四期,1925年5月15日。

聚合以及“站队”自古以来就有影响。赵园在《师道与师门——以明清之际为例》中提到,古代学子对同门、同年的关系相当看重,因为有了相同的老师,就可以和这个老师以及他所有的弟子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也是形成朋党的原因。“同年”指同一年、同榜录取的考生,“同年之间不需要特别联谊也存在一种关系,有可能在政治上结党,也可能在官场上互相支援。”^①现代科举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已不存在同年之谊,他们的聚合更多受到现代教育的影响,但传统的同门关系却依然产生着作用,在需要支持的时刻这种情谊尤为重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称,钱玄同曾到绍兴会馆请他为《新青年》做文章,除去鲁迅所理解的“希望是在于将来”^②,恐怕出山的另一原因是因为他和钱玄同皆属章太炎门生。同门师兄弟在面对不同立场或利益时,往往会选择站在同门的一边。胡适门生傅斯年就对章太炎的学术表示轻视,对王国维却大加赞赏。实际上在“五四”前后,章太炎与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地位是旗鼓相当的,却因章太炎参加过革命,又有众多在新文学界声名显赫的学生,因此章氏声名远超过王国维。章太炎本人曾表示不太认同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学术主张,所以傅斯年此举不能说没有门派之见。

除了“站队”问题,师承关系还影响着观念的表达。文人一旦拜在某大师门下或是围绕某位大师形成一定的圈子,那么他们的话语立场就会为整个群体所约束。文人的个性或许会为同门等人情因素掩盖或变得曲意跟从,在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中也能发现“不情愿”的声音,但对于把一个群体看成不变的整体而言,探究个体的差异反而更有意义。

恰由于师承关系从属传统人际关系的一种,因而研究“五四文学”与师承关系的关联,还在于近年来学界对于“五四”“现代性”意义的反思。一直以来,学者对现代文学如何“现代”有相当多的界定,从早期的唐弢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合力作用下的结果^③,到王瑶对西方

影响论的反思,认定“‘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既是现代新文学历史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传统文学历史的新的解释者,而且这两者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④更有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切切要将中国文学推向国际场域的用心”(王德威语)^⑤,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来源及其独立性始终是学者们思考的问题。

研究者们也试图为“现代”找到依据,王富仁认为“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基本概念的混乱”,目前需要的是建立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概念系统”^⑥。在论到如何建立时,他则先见地提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虽受西方影响,却“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而是一个与“‘中国古典主义’相对举的文学概念”^⑦,这就有意识地把中国现代文学从西方“影响论”的模式下解放出来。但需要思考的是,作为文学史主流的“现代”是否真能代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被忽略甚至沦为反面的声音,是否又与现代绝缘?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史以“‘现代’标尺清除异己,把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排除在文学史体系之外,形成了以‘现代’作为入史标准的话语霸权。”^⑧这种观念反映了近来对“现代性”观念的一种隐忧。自“五四”始,不论社会或文学都以“现代性”作为评判进步与落后的标准,而实际上意识形态的“进步”与文学观念的“进步”并不能完全等同。其“现代性”的含混,使得文学史中出现的观念、主张、论争有了更丰富的特点,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如师承关系也应不再作为现代性的反面,而是被纳入到对文人群体的考察中。

“五四运动”的复杂性体现在它的双重含义上,即它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目的在于启蒙,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

①赵园《师道与师门——以明清之际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②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

③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④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页。

⑤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⑥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⑦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上)》,《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⑧李永东《新文学的“独家逻辑”与“一家之言”的文学史》,《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①胡适亦称,“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②鲁迅、胡适等人的心路历程基本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观念,要求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必先启蒙愚弱的国民。

“五四”爱国运动却在世界政治波谲云诡的博弈下使“现代性”呈现出了另一面特质。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③在他看来,由胡适等人倡导的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并不能代表“五四”所具备的历史意义,唯有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才能体现其价值,因此“五四”亦拥有了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诉求。

虽有学者认定“这两个运动就其思想倾向而言是不完全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④,但是笔者却认为不应该忽略参与这两场运动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处的西化与民族国家建构双重环境下的复杂体验。他们对于激进的认同,对于文学政治化的转向,都不能简单地用启蒙与救亡来解释。唯一确定的是,每一个“传统”均是由当时的“精英”所倡导兴起,“精英们”所认同、提倡的就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反对的就成为“现代性”的反面和阻碍,“五四”所具备的丰富的“现代性”内涵被简化为“精英立场”。

而现代文学发生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精英们组成了合乎启蒙与革命双重标准的文学史,可他们聚集弟子与追随者的方式,却十分类似传统师徒门派中的关系。同门间不遗余力地支持彼此的观念,门派之别更让他们在评判别派时偶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现有研究从阐释观念主张来评判各个文人群体,他们呈现出来的思想观念确能代表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但是始终无法解释他们因何而聚,成员与成员之间究竟有哪些联谊。只有弄清楚这些,我

们的现代文学史才是一部由鲜活的文学史,从此出发,力图探究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叙述模式。除此之外,现代性作为评判标准,还被细化为制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语言现代性等层面,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研究已然取得丰富的成果,但以人与人关系作为依托的文学研究,却依然有待发掘和阐释。

三、师承关系对“五四文学”的参与

具体到师承关系与“五四文学”的互动,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首先是师承关系对“五四”文人结社的参与。传统的师承关系会在师父与弟子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联系,他们以伦理关系为纽带,自觉地以某个门派自居,因此传统师徒关系拥有一定的排他性。而在“五四”时期,师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虽然身边依旧聚集着弟子与追随者,但聚集的根源却发生了变化,不再全然凭借身份的高下,反而靠的是观念的相近。需要甄别的是,师徒传承,从师到徒,却并非有“师”就一定在文坛上形成掀起风浪的文人群体,但不能否认的是,确有很大一部分文人结社是以师承关系为依托的。就社团建构而言,“五四”时期一些社团的风格就鲜明地显现出师父的个性,如鲁迅扶植下的未名社、莽原社与狂飙社。未名社主持人韦素园,“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⑤,文学事业上尤其注重苏俄文学的翻译。莽原社同人着力耕耘在当时文坛缺少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方面。鲁迅曾称,“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⑥至于狂飙社,其主张“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⑦的精神正符合鲁迅对“战士”“超人”的期盼。从社团特色的角度看,这三个文学社团,恰恰各自应对了鲁迅对新文学走向的设计。既有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又有对传统的批评,还有狂飙突进式的

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②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④杨春时《两个五四: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

⑤鲁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5-16页。

⑥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第二期,1926年1月25日。

⑦鲁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3页。

锐意进取,基本上符合鲁迅对“五四文学”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建设的期望,师父的观念真切地体现到了他周围的文学社团中。

除此之外,与现代文学社团密切相关的还有发表观念的阵地——刊物。朱光潜在《天地人》创刊号中写道,“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①刊物连接了作者与读者,既改变了文学的传播途径,又使得文学思潮走向大众,更“以文学刊物为中心”,促进了“中国职业作家出现”^②。文学刊物的大量出现象征着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创作机制、出版机制、文学社团、读者消费机制等联合“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体制力量”^③,然而理性化的文学体制内,师承关系却干预刊物的态度、出版和编辑。譬如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新潮社,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立新潮社的同时,也顺势创办《新潮》月刊,并借助《北京大学日刊》发文宣传“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④新潮社自成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传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新潮》得到师父胡适的大力支持,他甚至亲自为其写稿扩大影响力,所以新潮社才能从北大学生社团扩展到学校之外,在五四初期就能有巨大的影响力,连顾颉刚都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⑤而后顾颉刚借用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的阵地,组织郑振铎、茅盾等人一起宣扬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亦体现出发展师父观点的用心。

“五四文学”的实绩除了大量文学社团的出现,文学论争更是此起彼伏。其间既有社团与社团之间的论争,又有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从亲密到陌路的转变。在现今的文学史叙述中,文学论争一词往

往被简化为了各大社团之间因观念不同或话语权争夺而产生的口诛笔伐,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即在未见诸文学史的论争外,有着潜隐的势力划分,而这种差异是由于师门派系的独立性造成的。就以“五四”文人出国留学所接触的西洋师父来谈,胡适、吴宓、陈寅恪、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差不多同时赴美留学,但胡适成为杜威忠实的信徒,吴宓等人却对白璧德学说深信不疑。回国之后,他们各自拥有了一众信徒,除了弟子傅斯年、罗家伦外,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等人也基本是追随胡适的文学道路前行的。因此,文学研究会在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与南京高师诸人的论争,除了所知的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有主张上对文坛领袖胡适的追随。胡适门下的傅斯年曾把章门弟子马幼渔视作北大的“祸根”“罪魁”^⑥,并要蒋梦麟亦与马幼渔断绝关系,除去私交上的不合,更涉及不同学术观念的差异。

“五四”时期因师承关系导致的文学论争亦不止这一个例子。就以胡门弟子傅斯年来说,他古文功底本就极其深厚,进入北大学习后,更是深受章门弟子黄侃等人的器重,很有希望成为章门下一辈继承衣钵者。但恰巧此时胡适受聘来到北大,傅斯年在好友顾颉刚的推荐下去听了胡适的课,大受震撼,遂拜于胡适门下。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傅斯年把批判的矛头立马转向了北大中的章门弟子,这层原因要追溯到蔡元培对浙系文人的大力提拔上来。

蔡元培与章太炎同属浙江人。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后认为中国现代制度改革首先需从大学教育开始,而在寻求支持者方面,他把橄榄枝投向了同乡,因而在“五四”时期的北大基本可以说是“浙系”的天下,中文系更是为“三马二沈”所把持。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批留学英美的学子回国,蔡元培才有意识地招纳别省人才,皖系的胡适、陈独秀等就是此时进入北大的。然浙系势力强大,胡适虽善于交际却也不敢在章门师兄面前摆出“导师”的架子。为维护老师,傅斯年利用从胡适处所学,主动挑起对北大老师中章门弟子的批判。譬

①朱光潜《论小品文》,《朱光潜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②王本朝《文学现代: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③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④《新潮杂志社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13日。

⑤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20世纪中国名人自述丛书·学术名人自述》,杨里昂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⑥傅斯年《致蒋梦麟》,《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如评北大马叙伦的《庄子札记》,直斥马著“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来者。”^①对于自己的师父胡适则称“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②彼时傅斯年尚为北大学生,却敢批判观念不同的老师的著作,可见推崇恩师胡适之意。而与胡适一样来自皖系的陈独秀,到北大不久便因嫖妓事件在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联合上书之下,被校长蔡元培开除。汤尔和与鲁迅、许寿裳同期留学日本,沈尹默和马叙伦亦是章门弟子,他们在批陈独秀“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之外,是否真的只是为校风学风着想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现代师承关系在对“五四文学”论争的影响之中,还有一种情况则是不同的西(东)方师父对文人的影响。譬如留学日本的鲁迅就与留学英国的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有过笔战。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习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以理智、偏见、不满的态度去俯视,虽不满中国人的劣根性,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少有对中国病因的治疗,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因而在当时是难以被接受的。在与鲁迅发生持久论战之后,陈西滢不堪笔战烦扰,最终离开北大就任武大,而他们的矛盾可以视作师承关系影响下的观念差异,更可看出师承关系不仅引发了现代文学论争,还暗暗影响着“五四”时期现代大学中的人事安排与势力分配。

师承关系更影响着“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就小说的创作潮流来看,“问题小说”就体现着师父对徒弟的影响。周作人称“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③在问题小说的创作中最为得力之人便是周作人弟子冰心。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冰心并算不得周作人的及门弟子,但她却曾在燕京大学受教于周作人,听其讲过“国语文学”和“现代散文”的有关课程。周作人亦曾记载过自己在燕京大学授课时的经历,“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

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其时冰心女士还在这班里上课,废名则刚进北大预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现,这些人的文章后来也都曾选过。”^④所以冰心在求学之时,就率先接触过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思想,进而亦投身到问题小说的创作中,譬如其发表在《晨报》上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作品。

当然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鲁迅就不断在探索新的创作内容——乡土小说。在乡土小说创作中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走下去的有王鲁彦、许钦文、台静农等人,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期最得鲁迅创作精髓的皆是听其授课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初,许钦文、台静农、王鲁彦等人开始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当时的青年人因受着“五四文学”的影响和鼓舞,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创作,但初创需要引导,因此如许钦文所说,“只好注意先进的作家”,“除了他(笔者注:鲁迅),实在是很少可以使我受到影响的了”^⑤。鲁迅对青年一向非常照顾,对潜心踏实创作的弟子更是颇费心血,不仅帮助他们看稿、改稿、校对,还联系人帮他们发表和出版,因此很多人不无艳羡地称“许氏文章之出世,全由鲁迅批评得来。”^⑥除了授课的方式,鲁迅还通过培养文学社团把青年们聚合在一起,让他们自己办刊物。台静农就是在这种为社团贡献一份力的基础上,开始小说创作的,“台静农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了韦素园的奖劝,为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动手了。”^⑦从这点上看,鲁迅可谓是相当了解自己的学生了。至于学生,对师父亦是尊崇有加,如赵景深在《记鲁彦》中提到,“鲁彦的文章学的是鲁迅,连笔名都与鲁迅是同行辈的。一般的文学史常把鲁彦归入鲁迅一派,称为浙江的乡土文学家。”^⑧在具体的创作中,继承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的弟子则各有侧重和擅长。

在文学创作之外,“五四”文坛的领路人们亦贡献了学术论文的书写方式,即“述学文体”。因为现代文学若要与古代文学一样成为正宗,必须要有自

①傅斯年《出版界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②傅斯年《致胡适》,《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③仲密《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第七号,1919年2月2日。

④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钟叔河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⑤许钦文《钦文自传(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5期。

⑥许钦文《钦文自传(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5期。

⑦鲁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6页。

⑧赵景深《记鲁彦》,《王鲁彦研究资料》,曾华鹏、蒋明玳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己独特的学术史叙述方法。“述学文体”作为一种表达学术的文体形式,若从文体学的角度辨析,它由“体裁、体制和样式”^①组成。然而“述学文体”同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创作文体又不尽相同,因为“述学文体”的生成根源是基于学术表述的需要,其本体在“学”而不在“文”。陈平原曾称自己对“述学”的态度“颇为骑墙”,“不主张‘以文代学’,但却非常欣赏‘学中有文’”^②。“五四”以来的章太炎、胡适、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学术著作,恰是为现代文学“述学文体”做出了极好的示范。如陈寅恪的著作显示了“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③。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纲要》,则“对后来的新文学史编纂有着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创立了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包括“学以致用”和“树立朴素的学风”^④两个方面。除此之外,胡适更是“采用‘剥皮主义’的手法,逐步接近事物的核心”^⑤。大师们开创并实践学术史的叙述范本,使得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能被理性化地看待和记录。相比于文学的创作,“述学文体”在师徒间的传承反而更为深远久长。如同师从胡适的顾颉刚在五四后期逐渐转为系统的史学研究,而章门弟子鲁迅又在学习师父“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⑥的范式上尽力创作,更不论对20世纪30年代甚至今天各类丛书乃至文学史的编纂了。

师承关系既然能渗透到“五四文学”的发展中,那么“五四文学”也必定会承担师承关系解体带来的影响。就以俞樾为祖师爷的门派内部来说,就发生过三次“谢本师”事件。“谢”意指“谢绝”“辞谢”,而“‘本师’是指正式投拜的师尊,有别于一般说的老师。”^⑦中国传统向来尊师重道,而这发生在同一门内的连续三次“谢本师”,则格外引人注目。实际上不论把这种背离看成是对传统的创新还是师门关系的淡薄,都是从结果上关注“叛师”这件事情本身,而作为参与其中的师徒,到底这件事情对

他们当时或是事后的心态乃至未来的人生有何影响,对其文学创作又有何影响,则尚未被考察。

中国传统向来注重尊卑长幼之序,“五四”时期虽然倡导个性、自由甚至反叛、前卫,但所有的创新也都是从传统母体中脱离而出的创新。当大师们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学识与思想后,却被弟子们视作“反动”或“落后”,这种境况即便在“五四”时期也是难以被接受的。如鲁迅就被高长虹公开发文讽为“思想界权威者”,并称“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⑧鲁迅十分愤慨,憎恶其反感权威却又利用权威的行为,因此愤而回击,写下《所谓“思想先驱者”鲁迅启事》,声称自己与高长虹之狂飙社并无瓜葛。“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而对于被骂作“世故的老人”一事,则“身心之交病矣”^⑨。“破门”之事的当事人除了师父,还有就是弟子了。有学者曾论述把敢于向老师挑战、论争的师生关系看成“对师说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现代化性转换”^⑩,但由于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尊师观念,背叛师门的行为即使到了“五四”时期依然被视作大逆不道。叛出师门的弟子在文坛上或许会失去众人的认可和支持,而他们此后的文学之路亦充满坎坷。

四、结语

选择师承关系作为切入“五四文学”的关键,因为师承就根植于传统文化中,对千年的文化起着巨大的传承作用,可以说任何门派思想或技艺的传承都离不开师承关系。同时,师承关系虽为传统人际关系,却因现代教育制度的改革、出版业的兴起等因素,致使师徒关系的生成方式与相处模式较之从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思想观念的传承以及文人聚合上,却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师承关系既产生于传统、作用于传统,又能以新的姿态继续传

①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②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③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④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⑤陈平原《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⑥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

⑦刘克敌《困窘的潇洒——民国初年文人的日常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⑧耿传明《鲁迅与鲁门弟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

⑨鲁迅《所谓“思想先驱者”鲁迅启事》,《莽原》第二十三期,1926年12月10日。

⑩刘克敌《困窘的潇洒——民国初年文人的日常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承现代文化,可以看成是贯穿中西古今文化的载体。所以当师承关系这样一个可古可今、可中可西,又与文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游学交往、人际关系密切相连的契合点进入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碰撞出的奇妙火花。通过重识“五四”我们可以发现在所谓反传统的口号下,他们实际并未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这种状态或者说成是“以传统反传统”,文人借助发展革新过的现代师承关系,最大程度地集合了观念相似的同代人,以师徒、同门间的羁绊与合作,发出共同的声音,扩大在文坛上的声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五

四”为始的现代文学,不仅可以用现代制度的观念进行阐释,还可以从真正参与其中的人及彼此间的关系来阐释。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对传统的反拨并不仅仅是“五四”的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相反,通过研究现代师承关系在“五四文学”各方面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没有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销声匿迹,反而积极地融入到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或许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才能真正重识属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现代传统。

(责任编辑:晏洁)

The Collis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On the Involvement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he May 4th Literature”

GAO Xiao-ru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May 4th literature” has long been defined by various doctrines or ideological tren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y 4th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s changed greatly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erms of the teacher’s identity, ethical feelings, inheritance functions, the teacher’s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social relations, etc. A review of “the May 4th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can not only reveal that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ubtly affects the expression of scholars’ views and their choice of positions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but also serves as a perspective for re-examining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modernit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ctivities, all aspects of “the May 4th literature” such as literary societies, literary publications, literary debat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ar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modernity standards; literary activities; “the May 4th literature”